

丁玲与中国新文学

丁玲创作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专集

丁玲创作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编选小组编

丁玲与中国新文学
丁玲创作六十周年学术
讨论会编选小组

•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三明市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12.25印张 293千字

1988年6月第1版 1988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ISBN 7-5615-0095-5/I·5

定价：4.50元

目 录

丁玲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又一杰出作家	贺敬之 (1)
丁玲的创作道路与中国新文学的发展轨迹	郭 成 (5)
丁玲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罗宗义 (21)
——兼评现代文学史著作中的丁玲	
试论丁玲艺术追求之路	高文池 (35)
新文学交响乐中一个独特的活跃的音符	
——论丁玲及其创作的精神特征	于河生 (50)
丁玲与三十年代国左翼文学活动	黄平权 (66)
玲与中国解放区文学	刘增杰 (76)
拓者的艰难跋涉	
——论丁玲小说的贡献	严家炎 (87)
现代女作家中的丁玲	任伟光 (115)
丁玲小说的政治性	林唯民 (127)
写出“灵魂里的东西”	
——丁玲小说创作：“心理现实主义”艺术特征论	万直纯 (146)
从几个女性形象看丁玲创作时代性的特征	王建中 (164)
“莎菲型”女性形象的美的历史价值	陆文采 (180)
丁玲与茅盾小说中地主形象价值异同论	林卫理 (194)
论丁玲早期小说中的外来影响	彭漱芬 (211)

日记文学《菲莎女士的日记》与《狂人日记》

《腐蚀》的异同 [日本] 相浦 杲 (226)

试论丁玲小说中的叙述方式 [美国] 梅仪慈 (236)

革命知识分子走向成熟的艰苦历程

——《在医院中》主题思想再样 张永泉 (254)

《在严寒的日子里》独树一帜的特色 周勇胜 (269)

试论丁玲报告文学艺术上的小说因素 杨刚毅 (283)

《风雪人间》的美感效应 陈福郎 (298)

丁玲在解放区的戏剧创作 赵 朕 (309)

“文学作品是教育人，感动人”

——丁玲的文学目的论 华济时 (327)

“把生活中的诗变成文艺的诗”

——丁玲文艺主张的独特性 庄钟庆 (339)

论丁玲晚年的文艺思想 袁良骏 (356)

丁玲在新时期的文学评论 陈开鸣 (370)

她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又一杰出作家

——致丁玲作品讨论会

贺敬之

十分感谢你们邀我参加这次在湖南举行的丁玲作品讨论会的盛意。由于在这之前已确定去广东参加另一会议的日程无法更改，致使这次不能应约向你们和参加丁玲作品讨论会的各位同志请教，使我感到非常遗憾！谨此向你们致谢并乞原谅。

这次讨论会是在丁玲同志逝世后不久，在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又迈出新步伐的情况下召开的。因此不论在讨论会上或者在会外，痛惜丁玲、怀念丁玲这种诚挚的感情，认识丁玲、研究丁玲、学习丁玲这种热切的愿望，把越来越多的人的心连在了一起。作为丁玲同志所从事的革命文艺事业的后辈人中的一个，作为本可以早就对她有公允、客观的认识而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而无法做到许多人中的一个，此刻我的心是和会在会上的你们的心跳在一起的，是和会外的众多人的心跳在一起的。为此，我感到宽慰，感到力量。这力量来自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和党中央拨乱反正的壮举，来自历史的验证和人民的鉴定；当然，更重要的是来自客观实在的丁玲本身。

这次讨论会主要是讨论丁玲同志的作品，无疑这是研究丁玲的首要内容。在我看来，丁玲是继鲁迅、郭沫若、茅盾

之后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不是广泛意义上的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的又一杰出作家。她的作品无论在思想上或者在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无论是从革命文学的社会作用或者从其自身发展的意义上所具有的重要性,以及具体地在继承传统方面或者在开放、创新方面所取得的经验,所有这些都是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和给予足够的估价的。这样做,对于我们今天如何坚持并发展我国革命文学的优良传统,促进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是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的。

但除此之外,我觉得对丁玲的研究,还应当注重对作者这个人的全面研究。具体地说,就是把她作为一名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作家来研究。这就是除了把她的作品当做一个革命战士的革命品格的反映,当做一个共产党员党性的表现来考察之外,还应当研究她毕生走过的生活道路,研究她整个的革命实践和文艺实践。正是在这一点上,我想说,丁玲同志是我从现实生活中所能见识到的一位真正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作家,是一位以她党性的光辉使我感到确是为我们这些党员文艺工作者树立了榜样的人。不论是她在和阶级敌人作斗争或者和民族敌人作斗争所经历的严峻考验都说明了这一点。特别是在革命阵营内部和党内长期的不幸遭遇中所经历的令人惊叹的反复考验,更说明了这一点。她九死不悔的对共产主义的坚强信念,她始终不渝地对党和人民的无比热爱,她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坚持原则的革命精神,她不计个人恩怨、以团结为重的气度和苦心,所有这些都是使人在事实面前不能不被说服或者不能不放弃无端的偏见而予以承认的;丁玲同志确实是一位有坚强党性的党员作家,是我国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需要有优秀的共产党员作为中坚并且确实产生了这样的中坚的突出例证之

自然，在我们一代代的文艺队伍中，并不都是，而且也不应强求都是马克思主义者，更不可能都是共产党员。从五四新文学运动到今天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都有大批非党同志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有虽然拥护党和赞成社会主义制度但并不具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同志在为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出力。因此，不能用“党的文学”这一在特定范围内适用的概念来代替“社会主义文学”这一具有不同层次和广阔含义的概念，不能用共产党员的党性原则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作为普遍标准来要求一切文艺工作者和一切文艺现象。但是，这决不是说“党的文学”这个概念在任何范围内都是不能成立的，决不是说“文学的党性原则”这个要求对任何人都是不适用的。恰恰相反，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健康发展，不仅在过去和现在，而且也在将来，都必须在发展中正确地实现并巩固马克思主义（当然不是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必须对党员文艺工作者提出明确的党性要求，用党性原则衡量党员文艺工作者的社会实践和文艺实践。这正是社会主义文艺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它的本质特征之一。唯其如此，研究和丁玲，这对于我们在今天的新形势下加强党员文艺工作者的党性锻炼，在文艺战线认真端正党风，更好地发挥党组织和党员个人在各项文艺事业中的先锋模范作用，以促进文艺领域的改革和“双百”方针的进一步贯彻，促进社会主义文艺的大团结、大发展和大繁荣，是具有何等重要的现实意义啊！

在这里，我想无须解释，我当然不是说丁玲同志是完美无缺的人，也不是说丁玲同志是当前值得我们研究和学习的革命前辈中唯一重要的人。在这个问题上涉及到往事，更不

是要引起同志之间对那主要不应由个人负责的痛苦历史的回忆以致增添遗憾之情，这也是无须说明的。十分清楚的是：为增强团结、为总结经验，为事业前进，这是我们大家缅怀丁玲、研究和学习丁玲的明确目的。我想这次讨论会正是为此目的而召开的。也因为如此，使我和许多同志一样确信这次会议一定能开得圆满成功！

1986.5.30

按：这是贺敬之同志给丁玲作品讨论会的一封信，题目由编者所加。

！刚又意定既前更重等研育具县，荣耀大殊显美宗县志同研丁玲县不烈世舞，韩籍德沃脉舞，里亥市
前区学麻资揭门舞舞前兰县志同研丁玲县不烈，人前烟天
不更，事升既更市土国同个亥市。人前更重一御中华前命革

丁玲的创作道路与中国新文学的发展轨迹

郭 成

探寻中国新文学的发展轨迹。这是一个宏观的研究角度。以往，人们对此已经做过许多开拓性的工作。比如，有人依据社会发展不同时期的历史特征，来划分新文学的分期，显示出新文学与近现代史密切联系的特点；有人则依据文学流派的兴衰、文学思潮的嬗变来勾勒新文学的发展轮廓，让中国新文学在世界文学潮流的比较中显示出本体特色。这些工作，无疑地对中国新文学的学科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能不能从一个具体作家的角度来“扫描”一下中国新文学主流的发展轨迹呢？这种“微观解剖”能否得到对于新文学发展规律的整体认识呢——本文仅仅试图在这方面作点尝试。

必须说明，并非任何一个新文学作家都能来作为这种“解剖微观、观照全体”的典型。这种典型的选择必须基于下述两个事实：首先，不可否认新文学与它所赖以产生和发展的那个时代有着血肉相联的关系。新文学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的文学更清晰，更强烈地反映出时代的聲音。可以说，时代维系着新文学的生命，新文学的主体感即时代的主体感。因此，只有那些时代特色异常突出的作家，才最能清晰地反映新文学的轨迹。其次，就全过程而言，中国新文学是

指从“五四”前后开始，并发展至今的文学，它挂联着人们已经习惯称谓的“现代”与“当代”。因此。只有那些跨越两代，同时又能反映时代主体感的作家的创作道路才有可能凸现出新文学的完整轨迹。丁玲正是一个这方面的典型。在她的生活与创作发展中，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时代精神的直接显示。她六十年的创作紧紧追随着时代节拍。却又能以艺术的真实声音作出自己的回立。此外，我之所以选择丁玲作为本文的论述对象，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我认为，新文学的兴衰现象在丁玲的个人沉浮与作品褒贬之中反映得那样赫然显目，当代恐怕没有第二人！她走过的路，作为新文学历经千辛万苦，寻求光明前程的一个缩影，能够引起后人从二者的相似命运中产生深刻的历史反思。

下面，我们根据丁玲各个时期作品的主要思想倾向及其艺术特征。来看看她与中国新文学的发展究竟有怎样一种内在的、必然的联系。

第一个时期，人们常称为“在黑暗中”的探索时期。丁玲在谈到自己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时说：“我这本集子里的主人公，都是在黑暗中追求光明的女性，所以书名定为《在黑暗中》”。这一含义是很明确的。它既揭示了书中主人公所生活的社会背景，又暗示了作者早期所经历的一个艰辛的探索过程。丁玲并没有赶上新文学的第一个浪潮，她不象鲁迅、郭沫若、冰心等人在新文学一开场就驰骋文坛。当她出现在文坛时。新文学已经取得了一大批丰硕成果，新文学的发展轨迹在鲁迅等人的导引下。正朝着一个正确的方向延伸着。然而，这并不能说明，丁玲没有受到五四时期文学的影响。她自己说得很清楚：“我虽没有参加到‘五四’，没赶得上，但五四运动却影响了我。我在‘五四’浪潮极后边，

它震动了我，把我带向前边。”^②正是由于五四精神的熏染，丁玲才对残酷的社会现实有着清醒的认识，并在艰难的生活历程中，初步形成了不满现实，大胆追求光明的叛逆性格。她一方面，痛苦地“感到世界如同在一个灰色的深渊里找不到出路”。^③另一方面，内心又“充满了对社会的鄙视和个人的孤独的灵魂的倔强”。苦闷、痛苦、绝望、憧憬，反抗等多种复杂情绪交织在一起，迫使年轻的丁玲在创作一开始，就确立了“要代替自己来给这社会一个分析”的准则。

很明显，丁玲第一个时期的创作让人首先感受到的是五四新文学的一种内在节奏。与五四作家一样，她所描写的一系列悲剧人物，尤其是莎菲式的女性群象带有浓厚的悲剧色彩。他们生活在同样黑暗的社会环境中，呼吸到相同的时代新生的气息，都有着发自内心的反抗要求。叛逆与苦闷交织而成的时代声音，构成一股巨大的前呼后应的历史推动力。就其基本精神而言，丁玲作品中所反映的广大青年渴求自由，向往光明的共同愿望，与“五四”反帝反封建的大方向是一致的；她所表现的一系列创作倾向，正是五四以来新文学主导倾向的继续。

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一九二七年，中国文坛弥漫着瞬息万变、艰难交替的历史风烟。一方面，革命文学运动正在酝酿之中，尚未真正形成一个蓬勃发展的高潮；另一方面，随着五四新文学阵营的“最终分化”。广大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因为一时找不到出路所产生的苦闷彷徨的空气几乎支配了整个文坛。一些曾经蜚声五四文坛的作家。或投入实际的阶级斗争，或步入宁静的学者书斋……这种过渡时期所出现的短暂沉默，构成中国二十年代末文学发展的一个特殊现象，预示着以反帝反封建为主流的中国现代文学在新的历史

条件下将有一个更大的突破。

以描写个性解放与恋爱自由题材的作品来看，这种“突破”，已经势在必行。“个性解放”与“恋爱自由”作为五四青年觉醒的最初标志，在五四时期文学中占据着一个重要地位。作为一代青年的内心要求，这两个口号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增添着新的内容，同时也暴露出明显的弊端。五四退潮后，一部分找不到出路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几乎“把恋爱自由、恋爱的热情，以至所谓恋爱至上主义，看作所谓‘人生追求’的神圣的或唯一的目的”。早期资产阶级的进步要求，此时变成了一种“空虚”的幻想。尤其是一些从封建旧家庭冲出来的新女性，她们不仅没有找到自己渴望的真正爱情以及新生的道路。反而在冷峻的现实面前逐渐减退了五四运动焕发起来的热情，进而转化为一种悲哀与幻灭。这是一个历史新时期诞生前必然会有的“阵痛”。此时，文学与时代都迫切要求作家们来一个结束，或者准确地说，一个结束前的过渡。

丁玲从内心深处熟谙这些人物精神上的寂寞，理解他们的艰难处境以及要“找知己，找同志，找支援，找精神寄托，找生活道路”的种种要求，因此，她不仅“用小说代替自己来给这社会一个分析”，而且钻进人物的“灵魂里面，并且同自己的灵魂熔合在一块，以无穷的感动与爱，娓娓道出这灵魂深处所包含的一切感觉”，以此抒发对整个黑暗人间的不满与反抗。这样，就奠定了她第一个时期创作的基调：苦闷、彷徨而又交织着反抗与追求，低沉、感伤且又包孕着热情与激昂。她塑造的莎菲等人物已经不同于五四时期的“反抗家庭型”形象，她们已经走出家庭，来到广阔的社会，既感受到社会的不幸，也感受到时代变革前的骚动。如

果说，五四时期的爱情悲剧主要是由社会现实的迫害造成的，那么，丁玲没有局限于此，她还向我们展示了曾经对封建势力产生过巨大冲击力量的“个性解放”、“恋爱自由”的要求，怎样变成了空幻的“恋爱至上”的滥筋；展示了摆脱封建桎梏的青年，又怎样囿于资产阶级思想的囹圄而不能自拔，从客观上证实了资产阶级的思想和要求在当时并可能引导青年走上真正幸福的道路。正如冯雪峰所说：“《莎菲女士的日记》可以说是从一个恋爱追求者的少女所感到的恋爱本身的空虚，来说出‘五四’后那种脱离现实的恋爱自由的空虚，而莎菲的绝望也简直是对这类恋爱追求者自己的一种讽刺”。^⑤显然，丁玲早期创作的这一倾向，是五四时代“个性解放”要求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一个发展，是对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出路问题的积极思考，真实地反映了新文学本身所要求的题材突破。

丁玲的出现，是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小资产阶级作家向无产阶级作家过渡前的一个典型现象。自然，由于作者后来创作本身突然转变的鲜明对照，使我们可以较清楚地看到丁玲这一时期思想和艺术方面某些不够成熟的地方。正如她自己所言，一些作品“不觉的也染上一层感伤”。“社会的一面是写出了，却看不到应有的出路”。^⑥但总的说来，丁玲早期创作体现了新文学的社会革命因素，这一起点是坚实的，为她后来迅速走上无产阶级文学道路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历史的车轮进入三十年代。时代在动荡中发展演变，它呼唤着文学跟上步伐，去进行更深刻，更确切的反映。丁玲——不，应当说整个新文学在日益激烈的阶级斗争生活影响下。强烈意识到“在黑暗中”探索时期的结束。自此，丁玲

进入了一个以《水》为标志的创作转变期。

在《水》之前，丁玲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韦护》及《一九三〇年春上海》等作品。从题材上看，这些作品没有摆脱“革命加恋爱”的时髦风气，但它已经大大减少了莎菲式女性的苦闷，代之以热烈的革命的时代气息，显示着丁玲的创作与新的革命斗争生活逐渐结合的方向。这是丁玲创作的一个进步，也是新文学题材的一大拓展。接着，国内阶级斗争的尖锐激化，特别是胡也频等人惨遭杀害的血的事实。进一步坚定了丁玲的革命意识，迅速地将她推向无产阶级一边。丁玲曾说，“这时我的浪漫告了结束，我的整个进展改变了”。^⑦她担任左联党团书记，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成为了左翼革命文艺活动中的一员思想敏锐，创作丰富的骁将。

一九三一年，丁玲发表了中篇小说《水》。这部作品以一九三一年中同十六省的特大水灾为背景，真实地描写了广大农民群众同洪水，同饥荒、同反动官僚政府的斗争。作品中所描写的“天灾”，就是连年军阀混战和地主官僚残酷压迫人民群众的形象写照；人们同“天灾”的斗争，也就是对“人患”的反抗。因此小说不仅形象地展示了洪水给人们带来的无穷灾难，而且写出了农民群众的觉醒，以强烈的象征手法，生动地再现了一场向剥削者发起的。比洪水更凶猛的革命。这种及时将新的时代风云聚于笔尖的广阔的艺术视野。“从个人自传似的写法和集中于个人，改变为描写社会背景”的题材转移，为扭转当时泛滥成灾的“革命加恋爱”的公式化作品倾向起了积极作用，从而宣告了一种“新的小说的诞生”。

关于《水》在新文学发展上的意义。当时一些著名理论

家就给以了高度肯定。茅盾认为，“不论在丁玲个人，或文坛全体，这都表示了过去的“革命加恋爱”的公式已经被清算”。^⑧冯雪峰称《水》“是丁玲创作道路上的重要里程碑，是对中国新文学的重要贡献”。^⑨阿英则更具体地谈到：“《水》不仅是反映了洪水的灾难的主要作品，也是左翼文艺运动1931年的最优秀的成果”。^⑩很显然，他们是将《水》放在新文学的进程中从而加以考察的。因为作为一个里程碑，《水》事实上已经接触到新文学主流在三十年代发展的本质性问题；这种主流，我认为主要表现在这样两个方面：一是充分体现了一种进步的时代审美倾向。站在工农大众的立场，以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正确理解阶级斗争。显示人民大众自己的伟大力量，这是时代赋予新文学的审美要求，即在激烈的阶级对立中，进步的无产阶级必然产生的一种自我肯定的审美选择。《水》恰恰是着眼于人民大众，并且相信人民大众会由散漫变为团结，由愚昧走向觉醒。他们会自己掌握命运。一旦觉醒，便会朝着解放的大道上奔跑。二是显示了一大批作者由小资产阶级立场到无产阶级立场发生重大转变的趋势。三十年代的左翼文艺运动，一开始就将造就无产阶级文学队伍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大量青年作家面对血火交织的阶级斗争事实，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影响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转变自己原有的立场。正是这些新文学主力军积极投身到左翼文艺运动中来，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才可能在短时期内获得迅速发展；而他们自己的创作由于获得了崭新的生活内容，在艺术表现上，也相继出现了新的突破。在丁玲第一期的创作中，我们领略过她艺术个性的一面：感情的丰富，细腻与表现的委婉多变，构成了一个

特殊的天地，这个天地主要局限于小资产阶级女性的内心世界，相对来说，是狭窄的。雨在《水》中，“不是一个或二三个的主人公。而是一大群的大众。不是个人心理的分析，而是集体的行动的开展，它的人物，不是孤立的，固定的，而是全体中相互影响的。发展的”。^⑩场面如此恢宏，色彩这般浓重。作者仿佛把一个充满着原野气息的生活画面突然推置在我们面前。假若你已经习惯了莎菲女士那种细腻感情的表式方式。那么，在这个纷然杂陈的画图前一定会感到惊愕这是一种多层次，大幅度的场面渲染，没有丝毫缱绻的柔情，简单的勾勒与强烈的音色。形成的只是一种粗犷，奔放的气势。粗砺并非滥造，雄沉而无杂音，焕发着一股“阳刚之气”。如果作者的世界观不发生一个新的质的变化，要想在艺术上同社会生活发生如此密切的联系，那是难以想象的。

也许有人认为，《水》以及当时的一些革命性作品在艺术上显得有些粗糙。这，不可否认。然而，正是透过这些“粗糙”之处，我们看到了一个从文学革命到真正的革命文学之间的艰难跋涉。所庆幸的是，无论是丁玲，还是整个新文学。都已经意识到反映时代生活与提高艺术水准二者结合的重要性。当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取得了初步稳定的地位后，这种要求，必然会尖锐地反映出来。

当我们将视线再向下扫描时，可以看到，在新文学作家面前铺设着一条广阔的，然而又是十分曲折的现实主义道路。就丁玲来说，她逐渐克服了早期创作中的某些自然主义倾向，经过曲折的发展，进入了革命现实主义创作理论与实践的成熟期。

一九三六年，丁玲在党组织的营救下、结束了三年的幽禁生活，辗转到达陕北，解放区的崭新生活。开阔了她的眼

界，伟大的抗日斗争，磨砺着她的文笔。丁玲这一时期的重要作品，几乎都是她投身于实际革命斗争生活的产物。她一方面将笔指向日本侵略者，以大量事实揭露他们惨无人道的罪行，义正辞严，痛快淋漓，大大激发了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如《一颗未出膛的枪弹》、《新的信念》等就是这样的作品；另一方面则满腔热忱地讴歌投身抗战的广大革命人民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赞美他们艰苦卓绝的战斗精神与高尚情操。《夜》向我们生动地展示出这样的主题：随着革命的深入与发展。一批特定的历史过渡期的人物出现了，他们一面肩负着旧时代遗留的沉重包袱，一面勇敢地昂起头，向新的时代走出。他们每前进一步，都伴随着苦恼，甚至忍受着痛苦，然而，他们在前进中不断增添了对新生活的信心与力量。主人公何华明就是这样一个“跨着两个时代，两种农村社会生活”的人。作者以含蓄深沉的笔触，刻画了一个朴素而又憨厚的共产党员形象，以他的“缺陷”反射出他灵魂逐步升华的可贵，使我们感到他的一言一行是那样真实可信。作者的这一深入现实人物意识领域的能力，在以前的作品中已使我们万分惊诧。而在这里又表现出了新的特点。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作者“拥有这个世界及其意识和心灵。才能够把这世界和人物，塑成使人心惊肉跳的形象，用感染力而不是用概念或公式的说教去感服读者，使他们走进新世界。”^②

反映工农大众在革命斗争中的伟大作用。歌颂他们的英勇事迹和崇高精神，这是四十年代中国新文学的重大主题之一。无疑，这是新文学的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化。但是，在表现工农大众的同时，是否还存在一个克服工农本身的弱点这一问题呢？当时，的确有这样的情况：“对农民作为小生产者的一些弱点，开始在根据地一部分同志中间有所忽视。